

# 人才红利效应与四川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王学人<sup>1</sup>

**【摘要】**近二十余年来，如同全国一样，人口红利对四川经济实现持续快速增长发挥了重要的贡献。尽管现阶段四川的人口红利期尚未完结，但着眼于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的需要，必须认真重视“人口红利”效应逐渐衰减乃至枯竭所带来的不利影响。在当前及未来一段时间内，我们应当大力推动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的转变，使四川作为一个人口大省的优势得到更加高效的发挥，为四川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关键词】**人口红利；人才红利；可持续发展；劳动力；人口结构

**【中图分类号】** F01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0633 (2012) 06—052—06

改革开放以来，在寻求中国经济增长之源的过程中，人口红利问题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重视。尤其是伴随中国出口导向型劳动密集产业的迅猛发展，中国丰裕的劳动力要素比较优势得以凸显，人口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也一目了然。对此，以人口学家为代表的学者们将其称之为人口红利的贡献。然而，在经过多年的粗放型增长之后，我国经济似乎正在迈入新的发展阶段，曾经貌似取之不竭的劳动力市场也出现了结构性的供不应求以及劳动力薪资看涨态势。这种转变信号目前虽然还并不十分强烈，但是其隐含的意义却不可小看。如果失去了在人力资源禀赋上的优势，那么，面对愈演愈烈的全球化竞争，中国还将凭什么来立足？中国由“制造大国”向“创造大国”的转型将如何得以实现？要回答这些问题，需要我们深入理解人口与经济发展问题之间的内在关联，继而能够为政策制定提供方向。本着这样的宗旨，本文结合人口大省—四川省的实际，分析人口红利效应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以及当前面临的问题，提出未来应努力获取人才红利效应的观点以及相应的对策建议。

## 一、文献回顾

已故美国著名经济学家D. 盖尔·约翰逊曾指出<sup>(1)</sup>，传统观点通常认为人口增长对于经济增长具有负面影响，其中最负盛名的是马尔萨斯的论断，在其1798年的论著《人口原理》第一版中，他认为人口持续增长对粮食供应增长构成了压力，只有邪恶和苦难是抑制人口的因素。即便到了现代经济增长模型中，人口或劳动力的增加会导致人类福利增长缓慢的结论也依然是成立的。这一结论基于三个假设的支撑：第一个假设是收益递减规律，即，当人力要素增加，而其他生产要素保持不变时，该要素收益趋于递减；第二个假设是总投资与人口无关，即，在总投资既定的情况下，人口的增加将减少每一工人的资本数量，继而每一新增工人的边际产品将呈递减之势；第三个假设是生产率的变化与人口无关。在上述这些假设均得以成立的前提下，的确，我们对于人口增长对人类福利的影响所做出的判断很难不是悲观的。

然而，令人惊奇的是，现代有许多证据是与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有负影响的结论相悖的。回顾世界历史，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人口低增长的时期也是经济低增长的时期，而高经济增长率则与人口的高增长率如影随形。<sup>(2)</sup>举例来说，18和19世纪出现的首批工业化国家，基本上都是首批人口年增长率超过0.5%的国家。而20世纪下半叶，发展中国家出现了世界历史上最为迅速的人口增长，其同期的人均收入增长率也是最高的。虽然这一事实并不能充分证明人口的增长就是经济增长的根源，但至少表明了人口增长是可以与经济增长相并行的。

**【基金项目】**本文为2011年度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培养资金资助项目的研究成果。

**【收稿日期】** 2012—04—12

**【作者简介】**王学人，经济学博士，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产业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四川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主要研究领域为产业经济、宏观经济分析理论与实践。四川成都610071

---

随着分析的深入，学者们还进一步发现，经济增长并非简单地与人口数量相挂钩，更与其结构特征有关。<sup>(3)</sup> 如安德鲁·梅森 (Andrew Mason) 在考察了战后亚洲的人口因素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之后，认为是有利的人口条件为经济的迅速增长提供了源泉。同时，他还提出了“人口红利”的说法。安德鲁·梅森用劳动年龄人口的迅速增长来衡量“人口红利”，并将人均收入的增加归结为劳动人口增加所带来的高就业和高产出的结果。<sup>(4)</sup> 此后，戴维·E·布鲁姆 (David E. Bloom) 等也提出，一个国家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对经济运行会产生重大影响，即，如果少年儿童或老年人口居多，国家就需要投入大量的资源以保证其生活和发展，一定程度上减缓经济增长的步伐；相反，如果大部分人口是劳动适龄人口，将会更多地创造出财富，加快增长速度。<sup>(5)</sup> 这样就产生了所谓的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

人口增加为何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呢？D. 盖尔·约翰逊从人口总量的角度给出了解释。他认为，知识的巨大增长使农业生产率和全部人类活动的生产率的增长成为可能，而知识的增长一部分应归因于人口的增长。世界人口的增长从两个方面导致知识的增加：第一，人口规模越大，既定的知识进步所能带来的利益也越大，因此，把时间和精力投资于创造新知识的动力增加；第二，有更多的人口时，就有更多有能力做出巨大发现或者增长知识的个人。换句话说，就是在收入水平给定的情况下，人口越多，就会产生越多的发明，即技术进步率是人口规模的函数。<sup>(6)</sup> 此外，他还指出了人口增加促进经济增长的另两个原因：一是人口规模越大，就有越多的人分享技术进步的好处；二是人口规模增长所带来的规模收益递增效应。这正如《国富论》的作者亚当·斯密所指出的那样，劳动分工与专业化是市场规模的函数，而人口规模正是决定市场规模和从事生产性活动的企业规模的主要因素之一。<sup>(7)</sup>

从人口结构的角度，学者们指出，不同的人口结构特征将会对经济增长产生相异的影响。判定不同人口结构特征的最为简单而直观的指标，可以用总人口中非劳动年龄人数与劳动年龄人数之比的人口抚养比来显示。一般以15岁至64岁作为劳动年龄人口。14岁以下的少儿和65岁以上的老人为非劳动年龄人口，根据其所占总人口的比重可以计算出少儿和老人抚养比，两者相加即为总抚养比。当社会在某一特定时期的总抚养比小于50%时，可称为人口红利期，小于44%时为人口暴利期，大于62%即为人口负债期，大于68%为人口暴债期。<sup>(8)</sup> 人口转变带来的人口结构变化，将通过劳动力供应、储蓄和技术进步等三条渠道对经济增长施加直接或间接的影响。<sup>(9)</sup> 对于人口负担较轻的社会来讲，将可能会面临三个效应：一是较高的劳动力参与率带来的大规模的劳动力要素投入；二是赡养的老人和孩子数量较少所带来的高储蓄率；三是大量的冗余劳动力由生产率低的乡村农业部门转向生产率高的城市现代部门而带来的较高的劳动力配置效率。<sup>(10)</sup> 所有这些，都会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力。相应地，当人口负担加重时，这些效应自然也会随之减弱乃至消失，经济发展将有可能停滞下来，直至迎来人口结构的新转折。

但需指出的是，人口年龄结构的转变只是获取人口红利的必要条件，而非充要条件。事实上，影响人口红利获取的因素还有许多，尤其离不开相关的制度条件和良好的政策环境支持。<sup>(11)</sup> 面对同样的“人口红利”，东亚国家及地区和拉美国家在经济增长方面的表现迥异，主要原因就在于这两个地区的经济政策和制度存在着较大差异。<sup>(12)</sup> 这涉及到外贸政策、劳动就业政策、金融体制、教育、政府治理以及宏观经济管理等诸多方面。

当然，人口红利既然与人口转变阶段的变化相关，那么，人口红利也终究会趋向减弱乃至消失。然而，有文献指出，即便在人口年龄结构趋于老化的情况下，人口红利也还可能继续存在，其原因就在于，在此过程中，提高的收入水平、对未来收入不确定性的预期等因素将使得社会财富积累不断增加，同时，老龄化使得社会中的有效劳动力数量下降，导致社会中资本—劳动比率不断增加，并且这种增加的趋势是持久的，从而将能推动经济的持续增长。这被称之为“第二次人口红利”。<sup>(13)</sup> 但是也有学者强调<sup>(14)</sup>，如果仅从人口老龄化时期储蓄动机角度来观察，尚不能构成在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程度上堪与第一次人口红利相提并论的第二次人口红利。

## 二、人口红利效应对四川经济发展的影响

1、四川省人口红利期的形成。建国以来，四川人口的发展变化波动性较大。按人口增长水平高低的特点看，大体可分为四

个阶段，即两个高峰期、一个低谷时期和一个稳定增长时期。<sup>2①</sup> 第一阶段为1949年至1957年底，是四川人口增长的第一个高峰期，年均增长率高达2.68%；第二阶段为1958年至1962年，此阶段是四川人口负增长时期；第三阶段为1963年至1975年，是四川人口增长的第二个高峰期，平均每年净增229.4万人，递增2.95个百分点；第四阶段从1976年到现在，是四川人口缓慢增长时期。

在这四个阶段的转变过程中，四川“人口红利”的形成也和全国一样，源于第三阶段。尤其是1963—1971年期间持续十年超过30%的出生率和此后计划生育政策的全面实行，四川人口再生产类型实现了由“高、低、高”向“三低”的历史性转变，为四川省人口机会窗口的开启创造了有利条件。如果以总抚养比为主要指标来判断，四川的“人口红利”期大致始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因为从那时起，四川的总抚养比一直低于50%。到目前为止，四川的人口红利期已经持续了20余年。如表1所示，四川的总抚养比已经由1982年的64.1%、1986年的59.55%下降至2010年的38.73%，同一时期15—65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则从1982年的60.94%、1986年的62.28%上升到2010年的72.08%。全省人口年龄结构已呈现出典型的“中间大、两头小”的纺锤状格局。少儿人口的减少和适龄劳动人口的增加，使总抚养比下降，社会的供应负担相对较轻。这就意味着有更多的资源可用于储蓄，进而带动投资，促进经济的增长。

**表1 四川省各年人口年龄结构情况** 单位：%

年份	1982	1986	1990	1995	2000	2002	2005	2007	2009	2010
少儿抚养比	56.40	52.42	43.87	34.67	32.34	29.87	32.50	27.39	24.38	23.54
老年抚养比	7.70	7.14	8.60	9.81	10.83	12.24	16.24	15.72	17.28	15.19
总抚养比	64.10	59.55	43.47	44.48	43.17	42.12	48.74	43.11	41.65	38.73
劳动人口占总人口比重	60.94	62.68	69.70	69.21	69.85	69.09	67.23	69.88	70.60	72.08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1) 相关数据计算。

2、人口红利效应对四川经济发展的影响。有利的人口结构，加上从1978年以来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为包括四川在内的中国大陆地区获取人口红利提供了充足的条件。四川也由此进入了持续的经济高速增长阶段。据统计，四川的人均GDP已经由1978年的262元增加到2008年的15378元，增长了57.7倍。<sup>②</sup> 从增长因素分析的角度看，有研究发现，在四川1996—2007年的经济增长中，劳动力的产出弹性要远远高于物质资本存量的产出弹性，这充分表明了四川主要是依靠劳动力投入的劳动密集型增长。<sup>(15)</sup> 而这种长期的劳动密集型增长模式能够得以发生，正好与人口红利的贡献紧密相关。<sup>(16)</sup>

为了较为准确地了解人口红利对四川经济发展的影响，我们采用定量的方法来进行估算。借鉴陈友华的研究成果<sup>(17)</sup>，我们可以按照“人口红利因素对GDP的贡献率=(GDP<sub>t</sub> - GDP<sub>s</sub>)/GDP<sub>t</sub> × 100%”的公式来计算。在公式中，GDP<sub>t</sub>为含有人口红利因素影响情形下的t年的实际GDP，GDP<sub>s</sub>为不含有口红利因素影响情形下的t年的标准GDP。同时，GDP<sub>s</sub> = GDP<sub>t</sub> \* L<sub>s</sub> \* P<sub>t</sub> / L<sub>t</sub> \* P<sub>s</sub>，其中，L与P分别表示15—59岁组人口数与总人口数，GDP、L与P右下角的t表示年份，L<sub>s</sub>与P<sub>s</sub>分别代表标准人口(或参照人口)中15—59岁组人口数与总人口数，L<sub>s</sub>/P<sub>s</sub>为标准人口中15—59岁人口比例。<sup>③</sup> 根据以上公式，结合统计报表中的相关数据，可以算出如下结果。

在改革开放初期，由于15—59岁人口比例较低，还处于人口负债期，此时，人口因素对四川经济增长是不利的，如1982、1986年四川经济就未能分享任何人口红利，相反，其贡献量为负数。然而，随着此后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的上升和总抚养比的下

① [http://www.cpdrc.org.cn/rdzt/rd\\_gs\\_detail.asp?id=679](http://www.cpdrc.org.cn/rdzt/rd_gs_detail.asp?id=679).

② 2008年四川人均GDP比1978年增长57.7倍。 [http://www.sc.gov.cn/zwgk/zwdt/bmdt/200903/t20090309\\_618297.shtml](http://www.sc.gov.cn/zwgk/zwdt/bmdt/200903/t20090309_618297.shtml)

③ 标准人口是既不存在人口红利、也不存在人口负债的人口。根据陈友华(2005)的研究结果，标准人口中15—59岁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58.48%。详见：陈友华. 人口红利与人口负债：数量界定、经验观察与理论思考〔J〕. 人口研究，2005，(6)：21—27.

降，人口红利效应对四川经济的促进作用显现了出来，并且其贡献率迅速接近10%的水平。进入新世纪后，除了2005年、2006年可能受劳动力外流规模较大等因素的影响外，人口红利因素对当年GDP的贡献率均较高。而最近两年，在沿海经济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导致四川劳动力外流的势头也受到相应影响的情况下，人口红利因素对四川GDP的贡献率更是保持在较高的水平，2010年达到了最高点12.35%。因此，总的来看，近二十余年来，如同全国一样，人口红利对四川经济实现持续快速增长的确发挥了重要的贡献。

表2 人口红利对四川经济增长的贡献（当年价）

单位：亿元，%

年份	实际GDP	标准人口GDP	人口红利贡献量	人口红利贡献率	15-59岁人口占总人口比例 <sup>*</sup>
1982年	275.23	289.31	-14.08	-5.12	55.94
1986年	458.23	467.16	-8.93	-1.95	57.68
1990年	890.95	809.69	81.26	9.12	64.70
1995年	2443.21	2237.23	205.98	8.43	64.21
2000年	3928.20	3561.89	366.31	9.33	64.85
2001年	4293.49	3938.85	354.64	8.26	64.09
2002年	4725.01	4250.57	474.44	10.04	65.36
2003年	5333.09	4730.07	603.02	11.31	66.30
2004年	6379.63	5630.96	748.67	11.74	66.62
2005年	7385.10	6977.89	407.21	5.51	62.23
2006年	8690.24	8008.07	682.17	7.85	63.81
2007年	10562.39	9573.12	989.27	9.37	64.88
2008年	12601.23	11192.68	1408.55	11.18	66.20
2009年	14151.28	12685.05	1466.23	10.36	65.60
2010年	17185.48	15063.64	2121.84	12.35	67.08

注：因统计年鉴等缺少本栏数据，故本文参照15-65岁人口数的95%口径估算（60-65岁人口数占四川总人口数的比例大致在5%左右）。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1）相关数据计算。

### 三、影响四川人口红利效应的不利因素

1、劳动力供给的不可持续性。1990年至2000年，四川总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0.89%，比同期全国平均水平低0.18个百分点。<sup>30</sup> 2000年以后，四川总人口年增长率继续下降，已降到0.34%，继续稳定在较低的增长水平上。根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和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四川的常住人口在十年间减少了288万人。与此同时，四川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的快速下降已经开始。自2011年以后，四川省新增劳动力将出现逐年递减的趋势，“十二五”时期农村新增劳动力将从2011年的116万人逐年减少至2015年的94.5万人，呈明显递减趋势，年均递减速度为4.5%。<sup>（18）</sup>而早自2004年起就开始在长三角、珠三角等出现的“民工荒”的现象也逐渐蔓延到四川。云、贵、川、渝四地仅2011年短缺的劳工数量就估计至少在200万以上。<sup>（19）</sup>人口预测结果显示，到2020年后，四川的劳动力供给将逐步不能满足需求，<sup>（20）</sup>四川将进入人口负债阶段。这将给四川经济可持续性增长带来一定消极影响。

2、人口红利外溢明显。四川是全国劳务输出大省，每年都有数以百万计的青壮年劳动力涌向省外，这使得四川的人口红利效应扩散较大。据统计，2000年，全省流出省外人员大约为600万人，2010年则升至1050万人。<sup>（21）</sup>目前，四川省劳动力的代际结构正在快速更替，2009年全省“80后”、“90后”的新生代劳动力已经占全省劳动力的30%，成为新增劳动力的主体。

① 四川人口与经济发展研究。 [http://www.sc.gov.cn/zwgk/jjjs/tjsj/tjfx/200805/t20080505\\_275321.shtml](http://www.sc.gov.cn/zwgk/jjjs/tjsj/tjfx/200805/t20080505_275321.shtml)

然而，新生代劳动力更愿意到东部沿海城市工作，这意味着在未来一段时期内四川人口红利仍将继续大量外溢。

3、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国际上通常认为：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10%以上，或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7%以上，即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处于人口老龄化社会。按照这一标准，四川人口从上世纪90年代起就已呈现出日益接近老年型人口的趋势。进入新世纪以后，四川人口老龄化程度还在不断加深。第五、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00年，四川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7.45%；2010年，该比重升至10.95%，十年间上升了3.5个百分点，显示老龄化速度较快。目前，四川总抚养比高出全国4.56个百分点，其中老年人口抚养比高3.29个百分点。在全国各省市中，四川老年人口数量仅比山东少62.2万人，居全国第二位。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将带来社会负担加重、经济发展后劲不足等系列问题。仅在公共财政支出方面，据分析，如果按2000年~2009年保险福利费平均每年增加59.6亿元计算，到2015年，四川离退休、退职人员保险福利费支出就将超过1000亿元。<sup>[43]</sup>这将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4、人口素质水平偏低。人口受教育程度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口教育素质高低的重要指标。尽管自2000年以来，四川拥有大专、高中、初中文化程度的人口不断增加，仅有小学文化程度的人数持续下降，但是与经济发展的要求相比，四川人口的人口素质水平还偏低。全省每十万人拥有的大专以上学历文化程度人口仅仅在全国排名第25位，<sup>[22]</sup>明显偏低。同时，全省劳动年龄人口中初中及以下受教育程度的仍占八成以上，而大专及以上学历的仅占6.68%。这导致一方面技术工人供不应求，高层次技术工人短缺严重；另一方面，无技术专长的工人供大于求，在一些地区和行业甚至出现了“招工难”和“就业难”并存的局面。

#### 四、推动四川经济社会持续发展需要实现由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的转变

有学者提出，四川人口红利期预计将于2020年至2025年终结，届时，四川可能从原来的劳动力输出大省逐渐演变为一个劳动力输入大省，并面对劳动力数量和质量的三重压力，可能出现劳动力短缺、劳动人口老化、劳动力优势逐渐消失、农村劳动力向区域外转移面临困难等一系列问题。<sup>[23]</sup>很显然，如果不本着未雨绸缪的思想提早制定和采取措施，那么，四川未来的发展进步将难以继续。因此，我们认为，尽管现阶段四川的人口红利期尚未完结，但着眼于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的需要，必须高度重视“人口红利”效应逐渐衰减乃至枯竭所带来的不利影响。在当前及未来一段时间内，我们应当大力推动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的转变，使四川作为一个人口大省的优势得到更加高效的发挥，为四川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注入新的动力。这里所谓“人口红利”与“人才红利”两个概念的区别，就在于前者所指的是大量技能不高、综合素质较弱的普通劳动群体为经济所带来的收益，后者则指的是大量有所专长、综合素质较强的知识型、技能型劳动群体为经济所带来的收益。两者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反映出对劳动力投入的要求截然不同。“人口红利”只强调数量，而后者在数量的基础上，更为强调劳动力投入的“质量”。人才红利概念的提出不是偶然的，对四川而言，有着以下三个方面的现实意义。

第一，现代增长理论和实践充分证明劳动力质量优于劳动力数量。在经历了早期的古典增长理论对要素数量投入的关注之后，现代的新增长理论更为看重要素投入的质量和要素组合的效率。其特点之一就是新古典增长模型中“劳动力”的定义扩大为人力资本投资，即人力不仅包括绝对的劳动力数量和该国所处的平均技术水平，而且还包括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生产技能训练和相互协作能力的培养等等，这些统称为“人力资本”。<sup>[24]</sup>人力资本理论认为，在经济增长中，人力资本的作用大于物质资本的作用。人力资本投资与国民收入成正比，比物质资源增长速度快。按照人力资本理论，生产力三要素之一的人力资源可以进一步分解为具有不同技术知识程度的人力资源。有赖于教育投资等而获得的高技术知识程度的人力带来的产出，明显高于技术程度低的人力。这就充分证明了人才的价值和重要性。

其次，开放竞争格局需要四川强化在人力要素上的比较优势。尽管劳动力增长快要接近或达到峰值，新增劳动力数量出现下滑，但是从绝对数来看，四川劳动力的总体规模仍然在全国位居前列。据统计，到2030年以前，四川省将始终有超过6000万

<sup>①</sup>未富先老程度较严重老年人口抚养比全国第二. <http://sc.sina.com.cn/news/sc-all/2011-10-28/259-78890.html>. 四川省老龄人口增长速度加快. <http://www.jinglao.net/shehui/3986.html>. 2010-04-07.

的劳动年龄人口。<sup>(25)</sup> 这既是一笔不小的就业负担，但也是一种宝贵的要素禀赋。按照国际贸易理论，要参与当前日益激烈而紧密的区域竞争与合作，必须继续充分发挥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优势，方能有立足之地。而在新增劳动力数量出现减少甚至可能负增长的情况下，要巩固要素优势，就只能依靠提升劳动力的质量来实现。

再次，提升人力素质是四川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所在。从国际经验看，凡是人口众多、土地和资本稀缺的国家和地区，要实现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增长，其经济和产业结构都要经历由资源和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演进的过程。<sup>(26)</sup> 当然，这种转变并不容易，离不开具有相应素质和水平的人力资源的支撑。这正如约翰逊曾指出的那样，随着中国进入21世纪，非农业劳动力占全部城镇人口的比例逐渐下降，并趋于老龄化，中国的人均真实收入和经济增长率就不会再仅仅取决于从农业中转移出来的劳动力数量，而是更多地取决于这些工人的素质和生产率。<sup>(27)</sup> 具有较高素质或技能的人才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推动作用，将主要通过以下三种作用机制来实现：一是人才引领加快传统产业提升，即人才通过自身才智发挥直接推动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和文化创新，有效促进传统产业向高端化升级；二是人才引领催生新兴产业崛起，即人才依托其拥有的知识、技术和专利，能够吸引资本、项目、劳动力以及其它优质人才前来集聚，从而推动产业迅速崛起；三是人才引领推动重点产业集群。人才集聚具有巨大的“外部性”。一方面，借助于知识溢出效应，人才集聚有助于新思维的进一步激发，形成浓厚的创新文化氛围，从而进一步吸引更多人才集聚、激发更强创新活力。<sup>(28)</sup> 从人才对经济发展的这种作用而论，可以认为，未来四川持续发展的基础应该建立在人才和科技的优势之上。

总之，面对四川人口红利效应可能逐渐衰减的现实，以“人才红利”取而代之，将是必然的选择。这种转变不仅是必要的，而且考虑到以下两方面因素——（1）伴随“人口红利效应”下降而来的劳动力成本上升、产业整体竞争力下降等不利影响将日益显著；（2）需要珍惜利用现阶段“人口机会窗口”仍将开启一段时间所提供的有利的转变过渡环境，这种转变也是紧迫的，需要我们充分重视，并采取相应的对策措施。

#### [参考文献]

- (1) (2) (6) (7) D. 盖尔·约翰逊. 经济发展中的农业、农村、农民问题 (M). 商务印书馆, 2004. 238 — 239, 244 — 245, 206, 246.
- (3) 王旭. 西部地区人口红利效应与区域增长差距 (J). 西北人口, 2009, (3).
- (4) Andrew Mason. Population and the Asian Economic Miracle (J). Asia — Pacific Population & Policy, 1997: 43.
- (5) Bloom, D. E. and J. G. Williamson. Demographic Transitions and Economic Miracles in Emerging Asia (J).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J), 1998, 12 (3): 419 — 456.
- (8) 陈友华. 人口红利与人口负债: 数量界定、经验观察与理论思考 (J). 人口研究, 2005, (6).
- (9) 王德文, 蔡昉, 张学辉. 人口转变的储蓄效应和增长效应——论中国增长可持续性的人口因素 (J). 人口研究, 2004, (5).
- (10) 汪小勤, 汪红梅. 人口红利效应与中国经济增长 (J). 经济学家, 2007, (1).
- (11) (14) 蔡昉. 未来的人口红利——中国经济增长源泉的开拓 (J). 中国人口科学, 2009, (1).

- 
- (12) 尹振涛. 人口红利、财富积累与经济增长巩固洲 (J). 中国人口科学, 2008, (6).
- (13) Lee Ronald and Andrew Mason. What Is the Demographic Dividend? (J). Finance and Development, 2006, (43): 3.
- (15) 刘萍, 林鸿. 人力资本对四川经济增长贡献的计量分析 (J). 四川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 (6).
- (16) 吴建国, 喻萍. 人口、经济发展与四川的机遇——一个“人口红利”的视角 (J). 四川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 (1).
- (17) 陈友华. 人口红利与中国的经济增长 (J). 江苏行政学院学报, 2008, (4).
- (18) (21) 李秀中. 四川10年常住人口减少288万面临人口红利之变 (N). 第一财经日报, 2011-05-09.
- (19) 杨仕省. 西部调查: 民工大省也招工难 (N). 华夏时报, 2011-02-19.
- (20) 王学义. 四川人口转变风险性后果及应对策略 (J). 四川社科界, 2011, (4).
- (22) 祖明远. “人口红利”将尽, 四川怎样应对? (N). 四川日报, 2012-04-18.
- (23) 杨晓天. 新经济增长理论的局限性 (N). 湖北日报, 2007-12-21.
- (24) 徐虹, 项锡丹. “就业优先”是战略思路 (N). 四川日报, 2006-05-18.
- (25) 张华荣. 论劳动密集型产业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 (N). 中华工商时报, 2010-07-14.
- (26) D. 盖尔. 约翰逊. 经济发展中的农业、农村、农民问题 (M). 商务印书馆, 2004. 64-65.
- (27) 王立平. 以人才结构优化引领产业结构升级: 以苏州为例 (N). 学习时报, 2010-05-31.

( 本文责任编辑 王云川)